

● 华林甫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地名学

源流



中国地名学
源流



● 华林甫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地名学

源流

责任编辑：许久文
装帧设计：贺 旭

中国地名学源流

华林甫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71,000 印数：1—1,500

ISBN 7—5438—2081—1
K·264 定价：25.50 元

编者的话

《学海一牛鸣》是一套学术著作丛书，专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空前活跃，并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古为今用，更快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套丛书旨在为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学术园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与繁荣。我们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数年的努力，出好这套丛书。

“一牛鸣”除字面一般意义以外，又为“一牛吼地”^{*}之简称，指牛鸣所及的距离。这套丛书兼取二者之义，凡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即犹如牛之一鸣，其声宏亮，必然飞震林樾，闻于远处。学海茫茫，添一新作，又说明著述者已向前跨越一新的里程。

蒙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为丛书题签，谨此致谢。

湖南出版社文史读物编辑室

1995.12.

* 一牛吼地，梵语长度单位“拘卢舍”的意译。《大唐西域记》卷第二《印度总述·数量》：“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

序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期人类为了生存、生活以及人们之间的交往,就需要对某一地理实体取个代号,以便识别,于是就有了地名。早期的地名可能只是口头传诵的,以后又可能用一种符号代替。有了文字后,才以文字的形式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地名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多样化。由于地名是人类在不同时代与自然斗争和人类之间交往的产物,因此地名就与不同时代自然、社会、人文各种现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研究地名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地名学,就必然是一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有关系的综合性学科。

我国历史悠久,见于文字的地名早在三四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由于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人口众多,又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缔造的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国家,因此中国地名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在世界地名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近几十年来,地名学的研究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作为地名学一个分支的地名学史,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华林甫同志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他对与此相关的地名学很早就发生了兴趣。十余年来,一直关注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发表了十余篇有关地名学史的论文,都具有资料丰富、结构严密、论证翔实的特点,是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有幸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想假此篇幅谈几点对本书的看法:

一,资料丰富、系统、全面。地名学是一门实证性学科,要讨论

其发展变化的历史,首先要资料丰富、系统、全面,否则就无普遍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地理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从先秦的《禹贡》、《山海经》,汉唐的《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到明清的《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等等,不下百数十种,其中包含了大量地名信息,是研究中国地名学史的基本资料,不将这些著作翻上一遍,奢论地名学,全属悬空之谈。本书作者花了数年时间,将我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地名著作,全面查阅了一通,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即为本书写作的基础。

二,论证翔实,结构严密,脉络清楚,分析精当,也是本书一个特点。我国地名学是如何起源的,以后又如何从一个时期到一个时期发展过来的,全书在这个问题上论述脉络十分清楚,这有利于后人对某一时期地名学特点的把握。每一时期地名学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形成的,本书根据当时的资料,有许多翔实的论证。又如后一时期是前一时期发展的结果,又有什么贡献,本书都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三,不囿旧说,多有创新。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但在地名学这样一门传统学科里要有所创新,实非易事。由于本书作者对传统的地名学著作下过了很大功夫,因此就可能在有些问题上较前人有所进步。例如对过去学者未曾涉及的领域,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如因山因水命名地名规律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如历代地名学家和地名著作对地名学发展的贡献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又如对《水经注》一书在地名学方面的贡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国内一些权威学者不尽相同;又如对著名地名学著作《通鉴》胡三省注、《读史方輿纪要》中的一些错误也都一一指出,为后人带来很大方便。

四,初步建立起中国地名学史的体系。如上所述,以往有关地名学历史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但未成系统。本书根据中国地名

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各时期地名学特点和贡献,初步建立了中国地名学史的架构,虽尚不能说十分完美、成熟,但后人可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补充,使之更为完善,所以这种草创之功,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总之,本书作者在我国地名的产生、地名学的形成以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等诸方面,都作了总结性工作,对我们了解地名和地名学的历史给予了极大帮助,对今天如何科学地利用和管理地名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再说中国地名发展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地名学史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一种反映。例如从汉代到明清地名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中国疆域形成、政区变化、地区开发、民族融合、科技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的一个侧面,因此这部地名学史著作的价值,就不仅仅限于地名学了。

华林甫同志史学基础较好,以后又补充了历史地理学的知识,为他研究地名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获得硕士学位后一直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前年又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研究唐史地理,同时从事地名学史研究。这两门都是需要下死功夫的学科,开始时也比较枯燥,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是搞不出名堂的。他读书认真,学风踏实,无浮夸之气,有求实之心。这样做上十几年几十年是必有成就的,所以他这本书的出版,是水到渠成,我并不感到惊讶,就是希望他继续努力,有些地方还需更深层次的思考,包括本书的某些部分,还可作进一步的探索,将我国地名学史的研究再提高一步。

邹逸麟于复旦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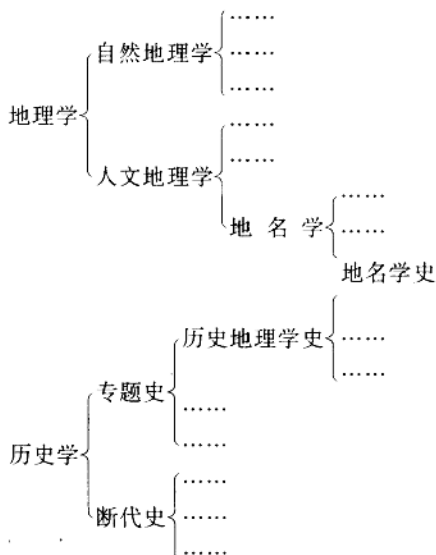
1998年4月27日

前 言

—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地名学史。

历史地理学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学的发展同样也会促进历史地理学的进步。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由来、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和功能,以及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以此而论,地名学史可定义为:研究地名学产生、形成、发展及其演变历史过程和规律的一门学术史。依一般的学科分类,地名学史既是地理学发展史中人文地理学史的一个分支,也是历史学发展史中历史地理学学术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下图所示,地名学史的性质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其目的主要在于阐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地名研究特点与成就,既是总结前人成果,又为当今地名学发展提供参考。所以,地名学史研究既要借助于地理学的一般方法,也要倚重于历史学的普通原理和常规手段,还须参照语言学、民族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研究规则。



二

我们中国的地名学研究起步很早,至迟在两汉时期业已奠定了传统地名学的基础,但发展缓慢,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在国外,地名学研究大多起始于19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发展十分迅速,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地名学均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现择要介绍一下美、英、法、前苏联和日本五国的地名学研究概况。

美国:早在1890年就成立了美国地名委员会。现在,50个州中大部分州都出版了各州的地名辞典,其中关于明尼苏达、华盛顿、加利福尼亚、肯塔基、内布拉斯加五个州的地名系统与分类研究著作问世较早。这些成果在美国地名文献中常常被称为范本。

学者盖内特(H. Gannett)所著《美国地名由来指南》(American-names: a guide to the origin of place-names in the United States)于1905年出版;40年后,斯德瓦特(G. R. Stewart)的力作《名称:美国地名命名的历史诠释》(Names on the land: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place-naming in the U.S.)也公开出版。50年代以来,美国的地名学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1952年美国成立名称学会,次年创办《名称》(Names)杂志。该杂志连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名通名及其在地名形成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成果,其中魏斯特(R. C. West)《美国地名通名 bayou 的地理学研究》一文被日本学者认为是“美国地名研究工作的一项可喜成果”。美国的地名学著作很多,如斯德瓦特《地球上的名称》(Names on the globe)、马修(C. M. Matthews)《英语世界的地名》(Place-name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哈德尔(K. B. Harder)《插图美加地名词典》(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place-names: U.S. & Canada)等。

英国:早在1919年,英国就成立了地名常设委员会。最为引人注目是英国地名学会(The English Place-Name Society)的活动,该会自1923年创立以来每年出版按地区区分的地名研究杂志,至1956年已出版19册。该会发起人之一、著名历史学家麦维尔(A. Mawer)于1929年首次在伦敦大学主讲了地名学课程,同年出版了《地名问题研究》一书(Problems of Place-name Study),书中详细叙述了地名同国家历史的关系、古代居民语言的不同层次以及地名的意义等问题。他还著有《英格兰地名研究》一书。195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的史密斯(A. H. Smith)著《英语地名成份》(English place-name elements)一书,则被认为是一部关于地名学方法论的奠基之作。英国的地名学著作也很多,如李内伊(P. H. Reaney)《英语地名的由来》(The origin of English place-names)、密勒(G. M. Miller)《不列颠地名发音词典》(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British Names)等。

法国:欧美国家地名学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不能不归功于法国语言学家吉耶龙所著《法兰西语言地图集》(1902—1910)。吉耶龙的方言分布图孕育了语言地理学,而精确的地名分布图却促进了地名地理学的发展。法国地名学奠基人隆农(A. Longnon, 1844—1911)在其去世后才出版的著作《法国地名》中,分析了法国许多居民地、河流、森林名称的由来和变迁。后来,多扎(A. Dauzat)把地名学水平提高了一步,其代表作《法国地名学、目的和方法》(1916年)详细分析了法国地名的构成,叙述了今后应把地名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地名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地名研究的方法、法国地名的历史层次、地名的变迁、地名历史文献的收集等。多扎在另一部著作《地名起源与发展》(1926年)中,提出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来探讨地名的年代层序。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38年7月在巴黎召开了地名学、人名学首次国际学术会议,有19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法国趁此在教育部内设立了国家地名学人名学委员会。目前,法国90多个省的大部分都已出版了本省的地名词典。

前苏联:前苏联地名学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922年至1958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一些地方性地名研究和地名考证成果。1959年至1975年为第二阶段,开始了地名学一般理论的研究,1959年发表的Б·А·谢列布列尼科夫院士力作《论地名研究的方法》,为苏联地名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础。1965年在列宁格勒召开了全苏第一次地名学会议,至1973年为止已召开了约30次这样的会议,出版了许多地名学专著和论文集,前者如Б·А·茹奇凯维奇《普通地名学》等,后者有《东方地名学的新研究》等。1976年至苏联解体为第三阶段,理论研究更加深入,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并且形成了地名学的一些学派。1976年,Э·М. 穆尔扎耶夫发表了50余页关于苏联地名学发展的综合报告《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对

苏联地名研究状况做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中,各加盟共和国都出版了地名专著和地名词典,《伏尔加的方言和地名》、《乌克兰水名词典》、《中亚专名学》、《名称地理学》等一大批论著问世。

日本:日本的地名学研究走在亚洲各国前列,可以明治维新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明治维新以前的地名研究,主要是对国、郡名和大地名的历史考证,代表作有源顺《倭名类聚钞》(914年)、内山真竜《地名考》(1803年)、阿部完堂《日本州名解》(1852年)等。明治维新以后,西欧的学问体系和研究方法传入日本,地名问题研究成为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共同研究的课题。20世纪初,日本迎来了地名大辞典兴起的时代,其中比较完善的是1907年由吉田东伍编著的《大日本地名辞书》(共五卷),该书至今仍有极高的价值。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从1910年开始,用了25年时间,通过讲演和撰写论文,成功地奠定了日本地名学的基础;这些讲稿和论文后汇编成《地名の研究》一书(古今书院,1936年)。到了1942年,中野文彦在京都创办了大和地名研究所,10年后改称日本地名学研究所。该所编著了《大和地名大辞典》,1957年至1962年间还编辑出版了《地名学研究》杂志(1972年复刊一年)。这对日本地名学研究的发展影响很大。80年代以来是日本地名学研究最为繁荣的时期,据日本《1997年历史图书总目录》(历史图书目录刊行会刊行),仅该年度出版的地名学著作和各种地名语源词典便有16种之多。

以上简要回顾了走在地名学研究前列的五个发达国家的地名学研究概貌。从中可知,尽管这些国家的地名学研究很发达,但多系具体地名或地名群的研究,工具书颇多,研究地名由来和追溯地名语源成为地名学研究的主流,而理论性、总结性著作相对要少得多,有关地名学史의论述只是散见于这些著作之中,没有产生专门的、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地名学史著作。

三

中国历代的地名学家及其地名学著作^①,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要多得多。古人当然不可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观察这些地名学典籍,近人事实上也没有从现代地名学体系上去审视中国地名学发展的历程,所以严格地说,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地名学史研究,肇始于本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只不过 20 来年的时间。

1979 年下半年,《地名知识》第 3、4 期刊载了陈桥驿先生《〈水经注〉与地名学》一文,文章主要研究了酈道元《水经注》的地名学成就。尽管今天看来该文尚有不完善之处,但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篇地名学史方面的论文。紧接着,两年之后陈桥驿先生发表另一篇论文《论地名学及其发展》(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 辑),扼要论述了中国地名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为中国的地名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即使近年发表的一些有关论文,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受陈氏影响的痕迹;当然,陈氏论文中个别不确切之处,它们也全数照搬。

陈氏《〈水经注〉与地名学》一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反应。刘盛佳先生在他的《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中写道:“拜读之后,一方面很佩服,觉得很受启发;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水经注》实质上是一部地名学著作,由于地名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故认为《水经注》是地理学著作也未为不可。有感于此,便以‘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水经注》’为题,撰写了万余字的论文。”该文发表于《华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3 年第 1 期。

1985 年,测绘出版社出版《地名学文集》,所收第一篇论文是

^① 地名学在古代尚未自成体系,也无专职的地名学家。本书所谓“地名学家”,是指舆地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或小学家在地名学上有贡献者。“地名学著作”亦可作如是观。

曾世英、杜祥明合写的《试论地名学》。该文第二部分叙述了我国古代对地名的研究,总结了传统地名学的特点,并且将开展对我国地名学史的研究列为中国地名学发展的七大任务之一。

鞠继武先生生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名典籍于地名学史意义的短篇文章,如《〈禹贡〉地名的历史影响》(《地名丛刊》1989年第2期)、《汉代的地名辞典》(《地名集刊》1992年第1期)、《酈道元在地名学上的杰出贡献》(《地名丛刊》1989年第5期)、《唐代两部地理总志》(《地名丛刊》1989年第6期)、《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学资料》(《地名知识》1987年第1期)、《清人屈大均对广东地名的研究》(《地名集刊》1990年第3期)等。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文章对问题的分析都停留在表面上,挖掘均不深刻,所以连作者也视作“史话”。

198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地名学研究文集》,收有孙冬虎《清代地名研究的成就与历史借鉴》一文,论述了清代学者对历史地名研究、地名起源与演变研究方面的成就。同书还收有牛汝辰《中国现代地名学前期研究概论》一文,叙述了民国时期地名学上的一系列建树。

此外,80年代的地名学史短篇论文,还有王新诚《我国地名学发展的历史回顾》(收入198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褚亚平主编的《地名学论稿》)、李嘉《我国地名语源学的滥觞》(《地名知识》1987年第3期)、王文凯《刘熙的地名学思想》(《地名丛刊》1988年第2期)、梁四宝等《胡三省在地名学上的贡献》(《地名知识》1988年第2期)等。

进入90年代以来,地名学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论述的问题也在趋向深入,显示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比较重要的是韩光辉先生的三篇论文,其《中国地名学的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回顾了古代中国地名学发展的全部过程,他在另一文《中国地名学的发展》(《中国科

技史料》1993年第4期)中将这一阶段称为“地名渊源与沿革研究阶段”,并把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文革”以前称作“近代地名科学研究阶段”,“文革”结束以来称为“现代地名科学的兴起和发展阶段”。1995年,他又发表《论中国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一文,重申了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学说。

199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地名学新探》一书,收有一系列具有一定深度的地名学史研究论文,如杨智红《论王应麟的地名研究》、郑潮坤《述顾炎武〈日知录〉、〈历代宅京记〉的地名研究》、谢英《屈大均〈广东新语〉地名研究述评》、李玉莲《论钱大昕的地名学研究》、韩昭庆《〈禹贡〉半月刊地名研究述略》、毛健生《我国政区通名丛谈》、庄信军《青藏地区历史上的蒙古语地名研究》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论文的作者均系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

除此之外,还有陈雄《〈越绝书〉与地名学》(《地名知识》1991年第3期)、傅贵九《〈郡县释名〉的学科价值》(《地名知识》1992年第2期)、栾广高《试论“遼师掌四方之地名”》(《地名知识》1992年第5期)等文。

在拙稿接近杀青之际,我有幸拜读了测绘科学研究院地名研究所孙冬虎与李汝雯合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的《中国地名学史》一书。尽管该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7期第9页的评论),但这是中国地名学史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地名学史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需要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专业学者们都来参与,共同合作,这样才能把这项研究引向深入、推向前进。

纵观我国近20年来的地名学史研究,多系地理学界学者们的奉献,史学界学者参与较少。应该说,地理学者从事地名学史研究有其长处,他们对地理学研究方法了如指掌,运用起来如鱼得水;但同样地,历史学者熟悉古典文献,从事这一领域研究也会有自己

的优势。

谭其骧、葛剑雄二先生早在1989年就指出：“即便是政区和地名的研究也是可以并且应该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的。我们从来不认为对政区和地名只要搞清它们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即它们存在的时间及所代表的地理座标和范围就够了，同样应该探求它们变化的原因，找出规律。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来专门做这方面的工作。”（见《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第588页）地名学史的研究，应属他们所期望的地名研究“应该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的一个方面。

1991年，年轻的地名学家胡阿祥先生就已指出：历史地名学研究“借重历史地理学，加强地名典籍及地名学史的研究，应是主要努力方向”（《地名知识》该年第6期）。两年后，他又发表《拓宽加深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中国方域》1993年第1期）一文，将中国的地名学史比喻为一座等待开掘的富矿，号召学术界“大力开展并拓宽、加深对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并且建议“脚踏实地地去研究地名典籍，就成了地名学史研究的第一步”。笔者遂自1994年分到住房后，即以《中国地名学源流》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随后就全力投入这一领域，循着胡氏倡议的方向，“脚踏实地地去研究地名典籍”，先后草成了《郭子章及其〈郡县释名〉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辑）、《略论〈华阳国志〉的地名学成就》（《西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盛弘之〈荆州记〉述略》（《中国方域》1996年第4期）、《论应劭、圈称的地名学贡献》（《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略论敦煌文书的地名学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论胡三省注〈通鉴〉地名的得与失》（《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1998年第2期）、《〈读史方輿纪要〉地名正误（浙江省部分）》（《书品》1998年第6期）、《略论〈元一统志〉的地名学价值》（已收入《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元和郡县志〉的地名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略论〈通鉴注商〉的地名学价

值》(将刊于《安徽史学》某期)、《简论吴卓信〈汉志补注〉的地名学价值》(将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某期)、《略论吕式斌〈今县释名〉的地名学意义》(待刊)、《中国地名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待刊)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撰成四篇篇幅较长、论证较为充分的论文,即:《论先秦时期我国地名学的特点》(《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论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的地名学成就》(《历史地理》第14辑)、《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在这些专题研究基础上,笔者完成了这项课题,本书即为结项的最终成果。

地名学史是一片新开垦的学术园地,那里有很多事情要做,为此笔者曾开了一个又一个夜车、啃了一部又一部地理志书;然而,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拙稿仍是一部很不成熟的作品,书中有些地方论述得还不够充分,有些内容暂付阙如,有些地方也容或有误,欢迎批评、指正。

华林甫

谨志于京城三环居

1998.3.31.